解嚴後民眾社團參與的變遷趨勢：年齡、期別與世代分析

熊瑞梅*、張峰彬、林亞鋒*****

摘要

民眾社團參與變遷趨勢是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關懷的議題，民主政治的效率和市民社會的發展都仰賴民眾積極的社團參與。本研究合併 1990,1992,1995, 1997,2000, 2002, 2005, 2007 等八年的社會變遷調查民眾參與社團的資料，引進 Young and Land (2006) 的年齡/期別/世代分析法，企圖針對台灣社團變遷趨勢進行期別與世代的效應檢定。本研究發現台灣在解嚴後，只經歷很短暫的民眾社團參與成長，民眾社團參與便逐漸地持續下降。從 1995 年以後便些微下降，到 2000 年後劇降，2007 年有微升的狀況。台灣從 1990 年到 2007 年的社團參與變遷趨勢，期別和世代具有顯著的影響效應。經過控制個人特質的固定效應（性別、年齡、年齡平方、大學與否、族群）後，期別的效應都顯著的大於世代。1990-1995 年民眾社團參與還算穩在較高的社團參與率，但 2000 年以後社團參與下降的趨勢便很顯著。1955-1959 的世代是社團參與最多的世代，其前後兩個世代也是積極參與社團的世代。1980-1984 年以後的世代出現顯著地不積極參與社團的現像。大學畢業者對地方性社團參與數目在時間期別的變異上不明顯，但大學畢業者對非地方性社團參與數目，在時間期別的變遷上卻很顯著。

*政治大學社會系教授
**政治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政治大學社會系碩士

一、　前言

臺灣自從解嚴後究竟民眾的社團參與行爲是呈現何種變遷趨勢，始終都缺乏完整且有代表性的長期資料來具體呈現變遷的趨勢與意涵。有些研究使用內政部公佈的社團參與資料描述性地呈現臺灣社團參與趨勢（王甫昌 2004；顧忠華、林勝偉 2004）。這些研究呈現解嚴後，臺灣民眾參與社團行爲是快速成長增加的。然而，有關民眾參與社團下降的變遷趨勢在近十年來成爲一個很重要的議題，主要來自於政治學家 Putnam（1995, 2000）的發現。Putnam(1995)使用美國多年期的全國性的民眾社團參與調查資料，發現美國民眾社團參與的下降趨勢，進而警告美國人有利於民主發展的社團參與所蘊含的社會資本在下降，這種變遷趨勢會導致美國社會一般信任下降，進而政府治理效率下降，而危及民主政治的發展。但目前台灣既有對社團參與變遷的研究，在資料品質和分析方法上仍需要更進一步地提升，並釐清台灣民眾社團參與變遷趨勢及其意涵。

西方學者在分析民眾社團參與的變遷趨勢時，都會將社區地方性的社團參與和社區外的社團參與分開。因爲社團參與變遷的趨勢，在兩種類型的發展模式是不同的。Putnam (1995)的研究也發現真正造成美國民眾社團參與下降的趨勢，主要是指鄰里性和教會的社團參與下降的趨勢；反之，一些新興的婦女和環保團體的參與是呈現成長的趨勢。Lin (2001)使用 1997 年臺灣社會變遷調查民眾社團參與資料分析時，使用因素分析法將民眾社團參與分成地方型(local)和全面型(global)，並發現能夠產生工具性報酬的社團參與是來自於非地方性的全面性社團的社會資本。本研究，基於以上學者的研究啓發，在分析上也嘗試區分地方性和非地方性或全面性的社團參與的變遷趨勢，並企圖對這些社團參與變遷趨勢提供理論和方法上反思的可能路徑。

美國社會學者對於民眾社團參與的變遷趨勢研究，從 1950 年代以來便一直有研究成果發表在美國社會學評論(Hyman and Wright 1971; Paxton 2002)。這些研究的分析方法，從早期的描述性統計的卡方檢定，到近期使用 SEM(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的方法來處理時期和社團參與的關係。有關於社會變遷的趨勢分析，過去人口學家都使用世代分析（Ryder 1965），但這些分析方法，始終面臨期別、年齡和世代間的線性依賴關係的估計問題，近年來在社會變遷分析方法上有重大突破。Yang and Land (2006)從 2000 年以來一系列的論文，都嘗試使用年

齡/期別/和世代(age/period/cohort)的分析方法，來驗證期別和世代的影響效果。本研究企圖引進他們的分析方法來處理台灣民眾從 1990 年以來的社團參與變遷趨勢，並企圖驗證釐清台灣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世代和期別效應。

從 1990 年以來，台灣一個主要的社會變遷趨勢是高等教育擴張。根據文獻，高等教育擴張是有利於民眾的社團參與和市民社會的發展。高等教育的人多半是中產階級的來源，這群人的社團參行爲是相當利益導向的理性選擇，期望社團參與的行動能有效地影響公共政策。因此，他們的社團參與行爲會隨著政治經濟社會變遷而變動。若社會改革沒有進步太多，這群高等教育的民眾撤出社團的趨勢也會比較明顯，特別是對非地方性或比較少集體情感連帶的社團參與反應會更明顯。反之，本研究假設高等教育的民眾對地方性社團參與的反應比較不會隨時間而變動太大。宗族、同鄉等血緣、地緣的社團參與，及祭祀和宗教團體的社團參與具有較強的社區整合連帶集體情感，社團參與的情感性功能較強，故地方性社團參與比較不會受時間脈絡因素的變動產生變遷。

總之，本研究將使用 1990,1992,1995, 1997,2000, 2002, 2005, 2007 等八年的社會變遷調查民眾參與社團的資料，進行 Young and Land (2006) 的年齡/期別/世代分析法。在研究中分成兩個階段的分析：第一個階段是描述民眾在各個社團參與八年的變遷趨勢。第二階段則使用年齡/期別/世代分析來檢定世代和期別對臺灣民眾社團參與變遷的影響效果。同時，我們也將企圖釐清高等教育對社團參與的影響力，在不同的期別上的變化。最後，我們進一步地針對非地方性和地方性的社團參與進行相同的模型分析。

二、 文獻探討

（一） 社團參與的變遷趨勢和意涵

從古典社會學家以來，「社團參與」始終都是社會學家關懷的根本議題。許多傳統的社會學理論認爲不論是都市化、工業化或全球化，人們在社區的互動本質上仍會相當穩定。社會變遷只會影響人們家庭的基本團體關係，但不會影響社區功能的次級關係，例如與社區有關的社團和宗教團體(Durkheim 1947)。從網絡社會學家的觀點中，社團參與有助於各種不同團體的連結，及個人與社會的連結。工業化與全球化促使社會分工更加細微，分化的團體與組織需要藉著民眾社團參與的重疊身份，而得以人與人、人與團體，團體與團體跨界彼此鬆散結合

(Simmel 1950；Granovetter 1973; Breiger 1974)。例如：職業工會和產業公會，公司的廠商老闆需要參加產業公會，藉著產業公會，政府與廠商可以溝通，廠商可以讓政府理解產業所面臨的困難。同理，許多工人都參加了職業工會，工會也扮演與雇主、工人、與政府間的橋樑者角色。藉著參與這些團體，個人、團體和社會是可以鬆散整合起來的，故社團參與的程度會影響民主社會的組織治理效能(Tocqueville 1961)。總之，民眾社團參與的成長，意涵著市民社會和民主效能的增進(Fung 2003).

但近年來，Putnam（1995；2000）發現連這些過去很穩定的社區型態的社團參與都有下降的趨勢，故對於具有社區凝聚力的次級團體或志願組織參與的下降趨勢感到憂心。一般而言，志願組織具有收斂關係網絡，形成社會控制規範和彼此強化信任的功能。Putnam (1995) 發現的教會出席、公眾會議出席、投票率和花在鄰里社交時間、感覺信任的程度都下降。這才引起他擔心人們的地方性市民參與程度下降趨勢衍生的民主發展問題。Putnam（1995, 2000）認爲這樣的社團參與變遷趨勢與民眾花在看電視的時間有關。換言之，電視媒體科技發達後，民眾參與社團的趨勢下降。但這樣的理由在台灣的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解釋上未必行得通，因爲，台灣民眾從 1987 年解嚴後，才開始自主性的社團參與，有限的資料和研究成果，還很難和西方社團參與變遷作對話。

目前不論是在政治學和社會學界，對於社團參與的理論發展上，比較明顯的方向是聚焦在社會資本的理論上。他們都認爲社團參與數目下降，代表了民眾的社會資本下降，即民眾的一般信任會下降，則民主政治效率自然也下降。社會學家則從社會網絡觀點來透視社團參與的社會資本意涵。這樣的觀點大致上圍繞在兩個結構效應觀點上：凝聚(bonding)和橋樑(bridging)的效應。一個是強調社團參與是讓志趣相投類似的人，有機會形成一個更加志同道合的團體（Mcpherson et al. 2001）；或社區鄰里學校父母子女間的網絡關係的封閉性，有利於信任規範的形成和社會控制功能的產生（ Coleman 1988)，故主張社團參與具有凝聚的效應(bonding)。同時，社團參與會藉著社團活動將來自不同的其他身份地位的人產生弱連結，社團具有將異質化的個人和團體連結成一個鬆散整合的社會(Breiger 1974; Granovetter 1973)，故社團參與具有橋樑者的效應。民眾越是熱衷於社團參與，則社團內部的凝聚力和對社團間的結盟搭橋整合的功能越強。Paxton (1999) 使用社會資本的觀點和嚴謹的資料分析，發現社團參與行動多寡和信任程度都說明了社團參與是一種社會關係的投資，這兩個成分是互相影響的。一個人一般信任越強，越願意參與社團，參與社團越多，對不同團體和不同的人的彼此理解和

連結能力越強，也趨向於一般信任越強。

有關於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證明，在分析方法上的不一致，也往往產生不一致的結論。過去學者在釐清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分析方法和解釋理論上都是相當籠統模糊的。Putnam（1995；2000）從社會資本的觀點，提醒學者正視美國社團參與下降導致民眾一般信任社會資本下降，所造成美國民主效率下降的後果。但由於他指出社團參與變遷趨勢，僅是採用比較粗糙的描述性統計，並沒有精緻地驗證變遷趨勢的存在與否，故討論社團參與變遷趨勢的後果，是有問題的理論假定。後續一些學者，針對他使用的美國 1974-1994 年社團參與調查資料，進一步使用較嚴謹的統計分析，結果很難證明美國民眾社團參與有穩定下降的趨勢。Paxton（2002）使用美國一般社會調查資料(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 20 年的資料，採取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SEM)模型來處理時間，信任、社團參與等多重指標間複雜因果關係。將時間當作這些結構模型的外衍變項，結果發現時間變遷趨勢的效果不是那麼明顯。當然，也有一些研究使用 Putnam 的資料，將社團參與分成社區型和非社區型，發現美國民眾參與社團參與下降趨勢，主要發生在社區型的社團參與，但非社區型的社團參與的下降趨勢不明顯。

（二）社團參與類型與變遷趨勢

社團參與的類型不同，其變遷趨勢也不同，因此，在從事社團參與變遷研究時，先區分社團參與類型可以減少不同類型社團參與變遷趨勢造成的混淆效果。許多西方研究也指出民眾參與不同類型的社團生產出來的聯繫和功能是不同的。大致上這些研究的發現多半是將社團參與類型分成地方型和非地方型的社團(Glanville 2004; Lin 2001)。

不同類型的社團參與生產出來的社會聯繫有何差別？地方性的組織是促進同質性的聯繫，但跨地方性的組織是促進異質性的聯繫（Glanville 2004）。社團參與是地方性的類型，則社團參與偏向情感連帶與地方集體認同的功能；但社團參與屬與跨地域的組織，則社團參與傾向於工具性的目的與功能(Feld 1982; Kalmijn and Flap 2001; Marsden 1990; Popielarz and Mcpherson 1995)。這樣的理論觀點，在實證資料分析上沒有得到穩定的結論。有些研究發現，人們在社團中認識的人較同質化，反而是親屬關係的個人特質上的差異較大。Popielarz and Mcpherson (1995: 698)認爲社團組織同質性太高，反而是社會整合的障礙。Mcpherson and Smith-Lovin (1982) 發現教會、鄰里與社區組織，規模較小，比較

少機會能生產生多元聯繫。

林南(Lin 2001)使用 1997 年台灣社會變遷資料，企圖將六種社區協會和七種一般志願組織分別進行因素分析。六種社區協會分成參與村里團體和參與教會團體兩群。七種志願組織分成專業和政治團體。再將這四種團體進行二度因素分析，而產生了地方性(local)和全面性(global)社團兩種類型社團參與。Lin (2001)鄰里組織社團參與和民眾特質的差距(range)無關，但其他非鄰里社團參與民眾的特質差距明顯地較異質多元。

不同的社團類型參與，其社會變遷的趨勢不同。Bear, Curtis, and Grabb（2001)企圖重新使用 Putnam（1995）的資料，將社團參與類型分成所有的社團參與類型，和剔除工會與教會社團參與。其實，美國教會和工會在 1974-1994 年是呈現社團參與下降的趨勢，當沒有納入這兩種社團參與類型時，研究發現，美國社團參與沒有明顯的下降趨勢。換言之，研究若將參與這兩個社團參與資料不考量，則社團參與數目在時間面向上的變遷趨勢是很穩定的。

（三）社會變遷趨勢分析方法

社會學家針對 Putnam(1995)社團參與的下降趨勢的研究，進一步針對趨勢分析嘗試各種精緻的分析方法，企圖釐清社團參與的變遷趨勢是否成立。Rotolo(1999)兩位研究者使用不同的統計分析方法，得到不同的研究結果。Rotolo 控制年齡和教育水準，企圖將時間當作一個變項，同時觀察時間的非線性的效果。他發現社團參欲趨勢是一個非線性，在 1974-1984 年時段社團參與是下降，但在 1984 到 1994 年有增加趨勢。Paxton (2002)也重新分析 Putnam 的資料，他使用多重指標的方式來處理，將時間視爲一個有高度相關的因素面向。他在社團參與上使用的變項是，投入在社區的時間和社團參與的數目。他使用結構方程式分析法（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無法證明時間對社團參與的多重指標面向有影響。換言之，這兩個研究經過嚴謹的統計分析時，都無法證明社團參與有穩定下降的變遷效果。

社團參與變遷分析長久以來沒有出現精緻的處理年齡、世代與期別的分析方法。在 1980 年代以前有關社團參與變遷的分析停留在不同時期的社團參與描述性比較，即將不同時段，民眾人口社會經濟地位特質對社團參與進行交叉分析的卡方檢定，及比較不同時段，這些基本人口社經地位對社團參與的影響有哪些變

化。Hyman and Wright （1971)針對美國在 1950 至 1970 年間的社團變遷進行描述性分析時，發現這段期間，教育程度高和社經地位高，參加社團數目也較多；但考量這些影響社團參與的人口社經地位特質在時間的變遷上，又發現美國在 1960 年代時低地位和黑人對參與社團數目的正面影響力增加。雖然，當 Paxton (1999)使用 SEM 分析方法，將時間當成一個面向因素，企圖將時間和社團參與的共變關係找出來，但這樣的分析，仍然無法釐清大型調查資料合併時從事趨勢變遷分析中，年齡、世代和期別對依賴變項產生的混淆效應。

使用多期別大型調查影響趨勢變遷的關鍵變項是出生世代、年齡和期別的效應很難釐清。年齡效應代表個人會隨著生命歷程而產生行爲的改變，期別(period)和世代(cohort)都反映了不同時間點所面臨的政治經濟環境脈絡，和不同出生世代的人們，共同分享相同的歷史經歷。這三種效應都同時造成行爲變遷的成分。過去從事多重調查資料合併分析時，往往將出生世代分類來分析世代效應(Ryder 1965)。許多使用多重期別資料分析社會變遷的研究，經常將年齡和世代混淆，故估計係數不穩定(Mason and Feinberg 1985)

時間趨勢的分析從過去世代分析研究演進到最近興起的年齡、期別和世代分析(age-period-cohort analysis)。近年來人口學家 Yang and Land(2006; 2008)針對使用大型長時期的橫剖面調查資料，進行趨勢分析，他們建議使用年齡—期別—世代分析。長久以來，趨勢分析中有一些影響成分是需要被拆解，長期趨勢的調查資料中，年齡、世代和時期之間是有線性關係，某個時間點的期別資料是等於受訪者出生世代加上年齡。這個線性關係，使得過去使用世代分析時，若將這三種類型資料放在同一個層次的分析單位來分析，則仍然會彼此產生高的共線關係，使得估計誤差大，估計值不穩定。Yang and Land (2006, 2008)使用 Cross-Classified Random-Effects Model (交叉分類隨機效果模型，CCREM)來釐清驗證趨勢變遷分析中的世代和期別效果（Raudenbush and Bryk 2002）。他們將出生世代分成每五年一個世代，出生世代和期別可以製作成一個交叉分類列聯表，這個列聯表的方格則是屬於期別與世代的交叉分層樣本數，當我們合併多重期別的大型調查資料時，每個期別對應世代的方格次數是不同的。使用交叉分類隨機效果的層級線性分析，可以釐清依賴變項受世代、期別和個人差異的影響力。本研究企圖引進這樣的研究分析方法，來釐清社團參與變遷趨勢年齡、世代和期別的效應。

民眾社團參與會隨著年齡、世代、和期別而有變化。一般而言，民眾年齡對於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是呈現倒 U 型(Erickson 2004)，民眾會隨著年齡從 20 歲

到中年呈現社團參與增加，從中年到老年會逐漸下降的趨勢；年齡和社團參與和年齡和一般社會網絡社會資本的變遷模式是類似的。不同出生世代的民眾所經歷台灣政治經濟社會環境是不同的，故出生世代的社團參與行爲也不同。政治民主開放的時代，民眾社團參與比較強；以美國的社團參與變遷趨勢，1950-1970 年代，是美國政治經濟強盛的時代，社團參與增加。從 1974-1984,社團參與下降，1984 到 1994 略微上升。換言之，1974 到 1984 年期間，美國遇到兩次石油危機和通貨膨脹，可見經濟和政治不穩定的時代，民眾社團參與有下降的趨勢。過去研究社團參與的變遷趨勢，幾乎都沒有將年齡、世代和期別的效應區分。因此，研究成果會出現不一致的現像。Yang (2008)也發現過去從事主觀幸福感變遷趨勢的研究也經常出現研究結果不一致的現像，關鍵因素在於研究者沒有將年齡、世代和期別的效應釐清，他也引進交叉分類隨機效果模型來重新分析釐清年齡、世代和期別的效應。

（四） 台灣高教擴張與社團參與的社會變遷

台灣在 1986 年正式宣佈解嚴，使得臺灣民眾的社團參與有自主權。解嚴前的國民黨政府時代，臺灣的社團參與可說是由國民黨控制的黨國威權統合主義。職業團體（工會與商會團體）幾乎都被國民黨員的領導幹部控制，無法代表團體成員的利益，社團主要功能在配合國家政策，會員較少有自主意識（朱雲漢 1989；李丁讚 2004 ）。解嚴後，中產階級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因爲中產階級對於社團參與的民間社會力的促進，和結社自由、自主、及追求正義公平和反省批判都有助力（朱雲漢 1990）。

解嚴後，許多社會學家投入社團參與研究，但研究方法多採用民族誌田野觀察法，紀錄民眾社團參與的社會過程與現像。有研究社區整體營造的專業地方文化營造組織和傳統地方派系之間的權力競逐的分析（吳介民、李丁讚 2006），也有研究探討台灣環保抗爭的組織在解嚴前由知識份子、草根力量、和黨外人士便啓動組織動員的能力（何明修 2000）。范雲（2003）也針對婦女運動組織，進行了完整的運動者的傳記記錄資料蒐集與分析，也發現台灣婦女運動組織的中產階級化的特質。這些研究都可以提供我們台灣社會運動組織的組織動員和民眾參與過程中，各種不同利益團體和社團組織的集體目標和民眾的認知的衝突，及社團與會員，社團與其他社團結盟，與社團參與對於大社會產生的影響的圖像。這些研究成果，提供台灣解嚴二十年來民間自主性社團組織變遷的圖像：台灣社會運動組織的形成與變遷，中產階級和大學畢業的知識份子扮演重要角色；雖然台

灣的社團組織變遷，越來越趨向組織化和專業化，但民眾在社團參與和社區活動參與的過程中，強調社團與社會利益的公民性並沒有增加。這些精闢深入的社團參與研究，大部分都是解嚴後，新興自主具有社會運動和社會改革的社團參與行動。從事個案研究的受訪者，大都是從事社團組織運作的行動者，而不是社團會員。因此，資料分析時會出現比較難推論民眾參與社團的整個結構變遷的限制。

但我們仍然可以從這些個案研究中掌握一些過去台灣社團參與學術論點的蛛絲馬跡。過去台灣學術研究成果對於台灣社團參與的地方性與跨地域的公共性的社團參與的效應與成長，有不同的觀察結果。在 1990 年代蓬勃發展的社會運動組織，和內政部提供的社團組織成員的數目，都提供了台灣民眾社團參與快速成長的圖像（王甫昌 2003；顧忠華、林勝偉 2004）；當社團數目越來越增加，照理說，社團彼此競逐社團會員，社團要能永續經營，持續發展，社團組織自然要更加組織化和專業化（李丁讚 2004）。某些研究深入地分析某個縣市各鄉鎮的地方派系發展過程，似乎勾勒出地方派系在選舉動員能力上的衰退使得地方派系展現瓦解的趨勢（王金壽 2006）。從這些研究的歸納，台灣過去二十年來，民眾參與跨地域性或比較有組織性和專業性的組織應該是呈現增加的趨勢。然而，林亞鋒（2007）整理台灣 1992、1997、2002 年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社團參與資料，發現台灣過去十多年來民眾參與跨地方性社團參與的數目是下降的。

但也有一些研究的成果，似乎也看到台灣傳統地方性具有情感連結和社區認同的社團參與仍然具有相當的制度慣性和影響力。誠如許多社區研究和公民性的田野質性研究的觀察，台灣有一些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投入社區總體營造的地方性新興組織和地方改革上，但僅入社區中，專業組織的影響力仍然很難和傳統地方派系與廟會結合而成的地方勢力（吳介民、李丁讚 2006）。在 Putnam（1995）研究中發現的教會參與下降的趨勢，在台灣的地方廟會參與的變遷趨勢中，似乎沒有發生。在地方上，廟會仍然是和地方政治和地方動員緊密結合的組織（蔡常斌 2005）。台灣社會的鄉土精神依然很強，民眾參與同鄉會、社區祭祀、宗親會和宗教活動（類似美國的教會活動功能）仍然保持穩定不變的趨勢(林亞鋒 2007)。徐永明、陳鴻章（2004）使用 1983-2001 年區域立委選舉資料，發現地方派系雖然有選舉動員效率降低的趨勢，但在政黨勢力競逐和議會地位影響力有深化強化的趨勢。可見，台灣地方性的組織有其相當穩定隨著環境調適但持續存在影響力的制度慣性。

中產階級與知識份子在台灣民主運動和市民參與的發展過程中，扮演關鍵性

的角色。台灣早期中產階級主要的組成份子多半是國民黨遷台帶來的外省籍文官和管理人員。新中產階級則主要以具有專業技能與大學學歷及管理人員等人力資本的成員（蕭新煌 1990）。台灣從 1990 年以來的高等教育擴張，使得，2007 年社會變遷調查總樣本中，大學畢業學歷者的比例已經高達約 25%。因此，這些具有中產階級和知識份子雙重身份的大學畢業生，隨著社會變遷在社團參與數目上的變化，應該是台灣過去二十年市民參與的民主化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中產階級的社團參與會呈現哪種變遷模式？蕭新煌（1990）主編的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一書中，多位學者研究企圖勾勒以大學畢業和專業人員組成的新中產階級具有的特性和面臨政治經濟社會變遷的反應。根據蔡淑鈴（1990）對於中產階級的定義，中產階級是在勞動者和資本家間具有多元異質的階級認同的人們。蔡淑鈴（1990）發現受過大學畢業教育者和專業人員都認爲自己所屬的階級和其他階級間有較高的利害衝突；但這群高等教育和專業者在支持農民上台北抗議的態度上，相對地比其他階級保守；但他們仍然是關懷公平正義的事務。蕭新煌（1990）認爲這群大學畢業及專業者，具有相當理性現實的性格，對社會改革運動也樂觀支持，若社會變遷不會帶來壞處，會支持；否則也會選擇撤退。從這些研究的論述，可以推導出台灣大學畢業的高等教育民眾，從 1990 年以來，和其他教育團體比，他們仍然是比較積極參與社團，有助於市民社會發展的一群人；但由於台灣過去經歷政權移轉和經濟衰退，政治經濟的不穩定，也影響這些高等教育者在社團參與數目的時間變遷效應是下降的趨勢。

台灣高等教育者在台灣民主改革和市民參與的歷史中，投入了各種類型的社會運動組織（張茂桂 1990）也形成不同世代知識份子的論述和社會改革的影響力（蕭阿勤 2008）。張茂桂（1990）觀察在 1986 年解嚴前，台灣知識份子在各種類型的社團組織扮演重要的領導性角色，例如：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婦女運動組織、環保組織、勞工組織、及原住民組織等。在 1986 年後這些知識份子仍持續投入這些社會改革社團組織，但這些社運組織在解嚴後有較多的政黨人士投入，使得知識份子從核心漸漸地被邊緣化，而漸漸地退縮。蕭阿勤（2008）指出世代、知識份子與台灣公共論述之間的關係。他認爲台灣不同世代的高等教育知識份子對於台灣公民社會參與和台灣認同上產生不同的集體意識建構效應。在 1970 年代的大學生在學校社團和社會參與的公共論述上，都呈現社會服務和民族意識的集體情感。但在 1980 年代的大學生則是促使台灣朝向民主改革的推動力量。若是 1970 年代的大學生，則是 1950 年代出生的世代。但 1980 年代的大學生則是 1960 年代出生的世代。我們認爲這兩個世代與台灣各世代相比，應該

是參與社團較多的世代，1960 年代出生以後的世代的大學生，對於公共參與的投入應該是呈現降的趨勢。

三、研究方法

（一） 資料來源和變數測量與描述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是合併臺灣社會變遷二期一次（1990），二期三次（1992），三期一次（1995），三期三次（1997），四期一次（2000），四期三次（2002），五期一次（2005），五期三次（2007）等八次的社會變遷調查資料。這八次的社會變遷調查資料都具有社團參與資料。其中 1990、1995、2000、和 2005 年是一組完全相同問法的社會變遷調查問題：請問目前你參加哪些團體？選項有：（1）宗親會（2）職業團體（如工會、農會、商會）（3）宗教團體（ ）同鄉會（5）康樂團體（如土風舞、早覺會）（6）校友會（7）祠堂、祭祀工業（8）政治團體（如政黨等）（9）社會團體（如獅子會、扶輪社、青商會、學術團體）（10）其他團體。在 1992、1997、2002 和 2004 年的問卷中也有問你目前參加哪些團體，1992 和 1997 年和前述的社團參與類屬相同。但從 2002 和 2007 年的選項設計有些變更，政治團體選項沒有了，但多了你參加哪些政黨的題目。在社團參與的選項上多了社區管理委員會和社區發展協會。爲了能從事八年的比較，1992, 1997, 2002, 2007 年的資料，只要是受訪者有參加政治團體或政黨都只過錄成參加了政治團體；由於 2000 年以前，沒有社區管理委員會和社區發展協會，故將這個社團選項歸類成其他社團。故八年的社團參與類屬完全相同，可以從事社團參與時間變遷的比較。

1992、1997、2002、2007 年的社團參與的問題，我們爲了能從事比較，將政黨併入政治團體。使用十種社團參與。當我們將這八年的社團整理成十組相同的社團，便可以將八年的資料合併成完全一致的十種類型社團。並進一步地使用 Mplus 跑探索性類別因數分析，十個社團參與變項區別出兩個因素。第一個因素命名成地方性社團：包括宗親會、同鄉會、社區祭祀團體和宗教團體。第二個因素命名成非地方性社團或全面性社團，包括其他六種社團：職業團體（如工會、農會、商會）、康樂團體（如土風舞、早覺會）、校友會、政治團體（如政黨等）、社會團體（如獅子會、扶輪社、青商會、學術團體）和其他團體。

本研究使用到的分析變項有性別（1＝男性，0＝女性）、年齡和年齡的平方

（由於年齡平方數值過大，故在除以 1000,在表格上比較容易呈現可讀性較高的數值）、大學畢業與否（以教育年數 16 和以上爲標準）、族群（本省閩南、本省客家、大陸外省、原住民）。有關於這些基本變項和社團參與的描述性分析分別在表 1 到表 2。 表 1 是八年資料中，性別、年齡、大學生比例、平均社團參與數及族群比例的概況。整體上說來，性別、年齡及族群的變化並不大，維持著相當穩定。在大學生比例中，1995 及 1997 年以後比例顯著的上昇，尤其是 1997—2000、2000—2002 及 2002—2005 都以將近 4%的比例增加，最後到了 2007 年，約有 1/4 的人擁有的大學以上的學歷，充分反應出台灣高教擴張的現象。

此外，平均個人參與社團數則呈現下滑的趨勢，在1990—1995相對穩定，但也在1997—2000開始大幅滑落，到了2005年的時候，幾乎只剩下前期的一半，但在2007年的時候，有開始回復的跡象。

表2是10個社團在八年中變化的情形，爲了較易觀察，區分成地方性社團以及非地方性社團。在地方性社團中，其變化的趨勢較不明顯，約都在11%—16%間跳動，但如果仔細比較各別四個社團，可以發現在宗親會、同鄉會及祠堂祭祀公業這三種的變化並不大，比例的變動主要來自於宗教團體，而宗教團體到了2007年的時候，有開始微幅上揚的現象。

在非地方性社團中，變化的就相當明顯，從1990到2005年止，都是下滑的，下降了將近一半的比例（42%—23%），也是到了2007年的時候，才又往上彈升。仔細觀察個別非地方性社團比例的變化，變動主要的原因來自於職業團體及政治團體。職業團體中，從2005年約只剩下1990年的三分之一，減少的相當劇烈，可見職業團體在台灣的發展衰退相當厲害。至於政治團體的變化雖然呈現跳躍性的下降，但如果分別將1990、1995、2000、2005，以及1992、1997、2002、2007來看的話，除了2002—2007外，其餘都是下降的（前者的調查中將政黨直接列入政治團體，而後者則區分開來）。因此，在非地方性社團的下降主力，明顯的是由職業團體及政治團體所造成的。

表3是根據樣本的年代以及其世代別製成的交叉表，年代就是每次調查的年份，而在世代方面，主要是參考人口學的設計，以5年爲一個間距（本次研究中的世代爲1925—1929到1985—1989出生的人）。本研究在合併資料時，只包括20歲到65歲的人口。在樣本的調查年代及其世代所形成的交叉表中，可以看到每個人都被歸類爲某一調查年的某個世代別，如此就可以進一步的運用HLM來分析年

代以及世代對於社團參與的現象，究竟有什麼樣的影響，其中特別關懷大學畢業與社團參與的斜率在時間期別的變遷上是否有差別。

（二）分析模型的設定

本研究是採用 Yang and Land (2008)的層級線性分析的 Cross-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模型分析法。他們的分析方法是將大型橫剖面調查多年重複測量的調查資料合併，進行年齡/期別/世代分析(age/period/cohort)。將多年期資料合併後，要建立一個世代和期別的列連表，行是期別，列是在不同期別的世代層，對角線則是某個出生世代所經歷的世代生命歷程。這樣的研究設計可以追蹤一個出生世代較長的生命歷程經驗。

由於期別與出生世代和年齡的線性依賴關係，造成估計方程式的認定問題(identification problem)，人口學家使用加總方式來計算不同期別，不同出生世代的生命統計指標。但社會學的調查分析單位往往是個人的。一般人口學的調查，可以使用五年時段爲一個區隔，但在個人資料分析時，我們可以將由出生世代群和期別做成的列連表中的方格視爲一個期別與世代的交叉聚集，這些交叉聚集可以使用層級線性模型的交叉分類隨機模型方式來估計期別和世代效應，又可以解決年齡、性別與世代的線性依賴效應。Yang and Land (2006)的方法，在相同期別和出生世代者分享相同的隨機誤差。若將年齡、期別和世代放在同一層次的線性關係上來估計，是會造成認定問題。世代和期別組成的群落，放在第二層次來分析，可以將世代和期別組成的群落視爲脈絡的隨機變項。如此，便可以進行檢定。可以使用層級線性模型的混合模型來估計脈絡效果。第二層次的脈絡效應採隨機的預設，對於世代與期別的方格不平衡的條件下，是比較適用的。

本研究採用交叉分類隨機效果模型（cross-classified random-effects model ，CCREM) Raudenbush and Bryk 2002; Yang and Land 2006）。本研究企圖針對三個依賴變項（所有社團參與數目，參與地方性社團數目，參與非地方性社團數目），進行分析模型，每一個依賴變項有三個分析模型。第一個模型是只有期別和世代效果。第二個模型是是將性別、年齡、大學畢業、族群（客家、外省、原住民，對照組是本省閩南）當作固定效果，而期別和世代交叉分類當作第二層。第三個模型則是預設大學畢業不是固定效果，會隨期別產生隨機效果。

我們表格呈現的方式將採用 Raudenbush and Bryk (2002: 373-398)的分析步

驟，先呈現只有層級一個人層次和層級二世代和期別層次的的無條件模型，其次再放入層級一的固定效果和層級二的隨機效果條件模型（加上模型方程式）。最後在附上加入大學畢業和期別隨機效果的模型。我們將所有社團參與數目的第三個模型設定如下：

個人層次：

所有社團參與數目$_{ijk}$ = β_{0jk} + β_1性別$_{ijk}$ + β_2年齡$_{ijk}$+ β_3年齡平方/1000 $_{ijk}$ + β_4本省客家$_{ijk}$ + β_5大陸各省$_{ijk}$ + β_6原住民$_{ijk}$ + β_7大學畢業$_{ijk}$+ ε_{ijk}

第二層次： $\beta_{0jk} = \gamma_0 + \mu_{0j} + \nu_{0k}$

$\beta_{7jk} = \gamma_7 + \nu_{7k}$

四、 研究發現

表 4、表 5、表 6 分別使用交叉分類隨機效果模型(CCREM)來估計影響民眾參與所有類型社團總數、參與地方性社團總數、參與非地方性社團總數的個人層級固定效果係數和世代期別層級的隨機效果變異數成分。以下將分別描述三個表的係數意涵。

表 4 模型 1 是只有估計世代和時期等第二層次的影響民眾所有社團參與數目的效應的無控制第一層固定效果的無條件模型(unconditional model)。模型 1 呈現世代和期別對民眾社團參與總數有顯著的影響力，其中世代影響效果(.070)比期別(.056)來得大。模型 2 是加入了個人層次的性別、年齡、年齡平方、籍貫和大學畢業等固定效果變項的模型。在模型 2 中，所有的個人層次的變項是採用 grand-mean centered 的估計變數，整個模型的 deviance 比模型 1 減少了 806, 自由度增加了 7, 若使用卡方分配檢定，是顯著的。可見這個模型的配適度是比模型 1 來得好。在模型 2 中，控制了個人特質變項後，世代和期別對民眾參與所有社團數目的效應仍然是顯著的，但期別的效果反而比世代來得大。模型 2 中呈現男性比女性參與社團數目多；本省客家、大陸各省、和原住民都顯著地比本省閩南人參與社團數目較多；大學畢業以上者比其他教育程度者顯著地參與較多社團。模型 3 將大學畢業對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在期別上視爲隨機效果，世代和期別的效應仍然顯著。模型 3 的 deviance 比模型 2 的少了 136,增加了 2 個自由度，經卡方分配檢定，仍然是顯著的，可見模型 3 比模型 2 配適度更佳。在模型 3 個人層次的固定效果，大致上和模型 2 差不多，僅有從年輕到中年社團參與數目呈現增加的現像變得顯著了。

表 5 呈現解釋民眾地方性社團參與數目的模型。模型 1 是只有估計世代和期

別對民眾所有社團參與數目的效應。模型 1 呈現世代和期別對民眾社團參與總數有顯著的影響力，但期別的效應反而比世代來得小。從前面描述性的資料上已經發現台灣民眾在地方性社團參與數目上，沒有明顯的下降趨勢。模型 2 是加入了個人層次的性別、年齡、年齡平方、籍貫和大學及以上等固定效果變項的模型。在模型 2 中，整個模型的 deviance 比模型 1 減少了 307, 自由度增加了 7, 若使用卡方分配檢定，是顯著的。可見加入個人特質固定效果的模型的配適度是比模型 1 來得好。在模型 2 中，控制了個人特質變項後，世代和期別對民眾參與所有社團數目的效應仍然是顯著的；但有趣的是期別的效應又比世代來得大。大學畢業與否和地方性社團參與數目無關。男性比女性參與地方性社團數目較多，年齡從 20 歲到中年參與地方性社團增加。本省客家、大陸各省、和原住民都顯著地比本省閩南人參與地方性社團數目較多。模型 3 將大學畢業對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在期別上視爲隨機效果，模型 3deviance 比模型 2 的少了 2,卻增加了 2 個自由度，經卡方分配檢定，模型 3 沒有比模型 2 更加顯著配適，還多用了兩的自由度。故解釋民眾地方性社團參與數目，第 2 個模型即可。

表 6 是呈現影響民眾參與非地方性社團數目的效應。模型 1 仍呈現世代比期別對民眾參與非地方性社團數目的效應來得大。模型 2 加入了個人層次的性別、年齡、年齡平方、籍貫和大學及以上等固定效果變項的模型。模型 2 的 deviance 比模型 1 減少了減少了 838, 自由度增加了 7, 若使用卡方分配檢定，是顯著的。可見這個模型的配適度是比模型 1 來得好。在模型 2 中，控制了個人特質變項後，期別對民眾的非地方性社團參與數目的效應反而比世代來得大。模型 2 中呈現男性比女性參與非地方性的社團數目較多；本省客家、大陸各省顯著地比本省閩南人參與非地方性社團數目較多，但原住民參與非地方性社團數目和本省閩南民眾沒有顯著差別。大學畢業以上者比其他教育程度者顯著地參與較多非地方性社團。模型 3 將大學畢業對非地方性社團參與數目的影響在期別上視爲隨機效果，期別的效應仍然比世代大。模型 3 的 deviance 比模型 2 的少了 53,增加了 2 個自由度，經卡方分配檢定，仍然是顯著的，可見模型 3 比模型 2 配適度更佳。在模型 3 個人層次的固定效果，大致上和模型 2 差不多，僅有從年輕到中年社團參與數目呈現增加的現像變得顯著了。

本研究更進一步地將模型中的跨世代和跨期別的平均殘差效應(average residual effects)圖式出來。圖 1、2、3、4 分別是針對整體、非地方性、和地方性社團參與的期別效應、世代效應、年齡效應和大學畢業的期別效應圖式出來。

在圖 1 中三種類型的社團參與的期別效應：從 1990 年以來民眾整體社團參與數目便微幅下降，但 2000 年以後便急劇下降，直到 2007 年才微幅上升。反之，民眾地方性社團參與數目在不同期別的變遷上變化不大，可見過去近二十年，民眾在地方性社團上參與是相當穩定的。民眾非地方性社團的參與數目的期別效應曲線比較類似整體社團參與數目期別效應變化。從 2000 年以後持續下降，在 2005 年才略為回升。

在圖 2 中三種類型社團參與的世代效應：1945 年以前出生的世代整體參與社團數目偏低，1945 年以後（二次大戰後出生）的世代開始增加參與社團數目，到 1955-1959 年出生的世代達到社團參與數目的高峰（這是九年國教開始實施的一代），之後的世代，社團參與數目便持續下降，1980 年代出生後的世代參與社團數目最低，之後又微幅升高。同樣地，地方性社團參與數目在世代的效應上，看起來沒有太大的變遷，相當穩定。不同世代參與非地方性社團的效應呈現倒 U 的曲線，早期出生和晚期出生的世代參與非地方性社團數目較少，1955-1959 年出生的世代仍然是參與非地方性社團數目最多的世代。

在圖 3 中呈現三種類型社團參與的年齡效應：民眾從 20 歲到 50 歲左右，整體和非地方性社團參與數目持續增加，之後，便呈現沒有明顯變化的趨勢。但對於民眾參與地方性社團數目在年齡上的效應上，相對地仍然是隨年齡增加微幅增加，但增加幅度很小。

在圖 4 中三種類型社團參與的大學畢業期別效應：台灣民眾大學畢業在整體社團和非地方性社團參與數目的期別效應曲線幾乎重疊在一起。換言之，台灣大學畢業者的整體社團參與數目和非地方性社團參與數目的在期別上的變遷模式是相當類似的。從 1992 年以來社團參與數目便開始下降，2000 年後又持續下降，近年來下降趨勢減緩。大學畢業參與地方性社團在期別的效應上是不顯著的，即大學畢業者在地方性社團參與數目在期別上沒有變遷。

整體而言，從 1990 年以來台灣民眾社團參與數目下降的趨勢，可說是因為台灣民眾參與非地方性社團數目的變遷模式所致。更有趣的是，這個下降的趨勢對受過大學畢業高等教育者而言，是更加明顯。

五、結論與討論

首先，本研究發現台灣在解嚴後，只經歷很短暫的民眾社團參與成長時期，便逐漸地持續下降。若從美國第二次大戰後民眾社團參與數目的變遷資料，可看出，美國的民主政治發展，是經歷 1950-1970 年很長一段民眾社團參與增加的歷史發展經驗；直到 1970 年代以後才有下降的趨勢。但台灣民眾的社團參與成長的經驗太短，面臨 1995 年到 2000 年代的經濟和政治的不穩定，民眾參與社團的數目便持續下降。經過嚴謹的時間/期別/世代分析，期別和世代對民眾社團參與數目都產生顯著的影響效應；而期別效應又較世代效應來得大。大學畢業者對地方性社團參與數目在時間期別的變異上不明顯，但大學畢業者對非地方性社團參與數目，在時間期別的變遷上卻很顯著；具體而言，大學畢業者從 1990 年以來，參與非地方性社團數目便顯著地下降。

過去學者使用內政部公佈的社團社員資料，呈現了和本研究相反的變遷趨勢。本研究的貢獻是，使用從 1990 年以來八年的全國性代表樣本，來釐清台灣民眾社團參與的變遷趨勢。特別是指出了高等教育者在非地方性社團參與數目下降趨勢的期別影響效果。照理說，台灣的高等教育擴張，應該是對市民參與的提升有幫助，也期望對台灣民主的發展和效率能夠提升。但本研究結果會令人擔心台灣大學畢業者對有助於民主發展的非地方性社團參與的減少，是不利於健康民主社會力的形成。台灣在 1997 年東南亞金融風暴和 2000 年的網路泡沫經濟，加上高教擴張，使得大學畢業生失業率和其他職業類屬的人相較偏高，是否這些不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讓年輕世代的大學畢業生減少投入社團參與的意願。研究也指出 1955-1959 年前後出生的世代社團參與數目最多，這和學者發現台灣 1970 和 1980 年代的大學生或知識份子，對台灣社會運動和民主改革都是具有貢獻的世代，本研究結果是能檢定這樣的世代效應。

台灣從 1990 年以來民眾對地方性社團參與數目變化不大，但對非地方性社團參與數目呈現下降的趨勢，這樣的變遷模式究竟有哪些社會學意涵？反觀，台灣民眾在宗教參與上，反而有快速上升的趨勢。台灣的宗教活動大致上是以廟會爲核心的宗教參與活動。這些宗教活動往往是社區事物、政治地方派系活動的核心，地方政治首長也擔任廟會中重要職務(蔡長斌 2005)，選舉時，廟會和宗教組織往往是資源動員很重要的管道。傳統鄰里社團靠著至地理親近性，參與社團的成本很低，且具有連結(bonding)的效果。台灣在解嚴後，社區營造的專業人士，進入社區和傳統地方派系產生權力競逐時，地方派系若和廟會等地方祭祀宗教活動

結盟，這些具有建構地方公民參與和公民性目的的參與者往往是無法和傳統勢力抗衡（吳介民、李丁讚 2004）。Putanam 的研究發現美國明顯下降的趨勢是鄰里的社團參與下降，但過去二十年，台灣地方性的社團沒有顯著的變遷趨勢，也可以說地方性社團反而是台灣過去持續存在穩定不變的民間社會參與力量。爲何民眾社團參與數目下降的同時，宗教團體參與的民眾再增加，而又以女性民眾增加較多。這些趨勢都是日後研究可以進一步分析研究的主題。

台灣民主發展過程中，期望能降低地方性較封閉的社團參與，增強中產階級社團參與的趨勢並沒有發生。學者都認爲能健全民主政治發展的市民社會，是需要仰賴中產階級和知識份子的社會參與，才能使市民社會更加成熟。台灣過去二十年來雖然高等教育人口急速擴張，但反而在社團參與上出現衰退趨勢，使得有利於民主發展的社團參與的公共性與市民政治反而萎縮。許多個案質化研究也一再指出台灣過去二十年的民主發展，市民社會的公共性不強。台灣民眾地方性的社團參與強化的血緣、地緣和宗教的力量都具有較封閉的社會控制連結效應，而缺乏多元包容的鬆散結合跨地方性團體的橋樑性連結。這樣的社團參與模式不利於多元包容的溝通發展。

大部分的全國性調查有關社團參與的題目，都只有問過去一年或目前是否有參與某些社團。換言之，我們這樣的詢問方式，是可以掌握近期的社團參與的行動。使用內政部的社團成員資料應該是比較不正確的，因爲這些資料，無法測量人頭會員，也無法測出這些會員進來是否有參加社團活動的行動。西方大型調查有關社團參與的問題，都是採用詢問社團類型。有關社團類型的分類要一致，本次研究爲了將八年資料合併，在政治團體和其他團體上作了些微的調整。但期望以後台灣社會變遷調查問卷設計時，在社團參與的問題設計上要考量長期比較的目的而設計。

參考書目

王甫昌，2003，〈社會運動〉。頁 421-452，收錄於王振寰、瞿海源主編《社會學與臺灣社會》。台北：巨流出版社。

王金壽，2004，〈瓦解中的地方派系：以屏東縣爲例〉。《台灣社會學》7：177-207。

朱雲漢，1989，〈寡佔經濟與威權政治體制〉。頁 139-160，收錄於《解剖台灣經濟：威權體制下的壟斷與剝削》。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李丁讚，2004，〈導論：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在台灣的發展〉。頁 1-62，收錄於李丁讚主編，公共領域在台灣。台北：桂冠圖書公司。

林亞鋒，2007，《社團參與、政黨鑲嵌與政治行爲之變遷——以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爲資料分析》。台北：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何明修，2000，〈台灣環境運動的開端：專家學者、黨外、草根（1980-1986）〉。台灣社會學 2： 97-162。

吳介民、李丁讚， 2005,〈傳遞共通感受：林合社區公共領域修辭模式的分析〉，《台灣社會學》9：119-163.

范雲，2003，〈政治轉型過程中的婦女運動：以運動者及其生命傳記背景爲核心的分析取向〉。台灣社會學 5：133-194。

徐永明、陳鴻章，2003，〈地方派系與國民黨：衰退還是深化？〉台灣社會學 8：193-228。

朱雲漢，1990，〈中產階級與台灣政治民主化〉。頁 233-244，收錄於蕭新煌主編，《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台北：巨流出版社。

蔡淑鈴，1990，〈中產階級的分化與認同〉。頁 77-96，收錄於蕭新煌主編，《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台北：巨流出版社。

張茂桂，1990，〈知識份子與社會運動〉。頁 189-209，收錄於蕭新煌主編，《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台北：巨流出版社。

蔡長斌，2005，《寺廟組織與平安燈文化的建構：制度與網絡的機制》。台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顧忠華、林勝偉，2004，〈社會資本理論定位與經驗意義：以戰後台灣社會變遷爲例〉。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報 37。

蕭新煌，1990，〈總論：台灣的中產階級何來何去？〉。頁 5-20，收錄於蕭新煌主編，《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台北：巨流出版社。

蕭阿勤，2008，《回歸現實：臺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出版。

Bear, Douglas, James Curtis, Edward Grabb, 2001, “Has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ctivity Declined? Cross-national Analysis for Fifteen Countries.” *Canadian Review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38(3): 249-274.

Breiger, R. L., 1974, “The Duality of Persons and Groups.” *Social Forces* 53 (2):181-190.

Coleman, James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 95-120.

Durkheim, E., 1947,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transl. George Simps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Feld, Scott, 1982, “Social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Similarity among Associat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7: 797-801.

Fung, Archon, 2003, “Associations and Democracy: Between Theories, Hopes, and Realiti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9: 515-539.

Glanville, Jennifer L., 2004,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nd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Why Organizational Location and Type are Important?” *Sociological Forum* 19(3): 465-491.

Granovetter, Mark,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1360-80.

Hyman, Herbert and Charles R. Wright, 1971, “ Trends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s of American Adults: Replication Based on Secondary Analysis of National Sample Surve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6: 191-206.

Kalmijn, Mathijs and Henk Flap, 2001, “Assortitative Meeting and Mating: Unintented Consequences of Organized Settings for Partner Choices.” *Social Forces* 79: 1289-1312.

Lin, Nan. 2001, “Social Capital: Social Networks, Civic Engagement, or Trust?” In *Annual Meeting of the Hong Kong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Hong Kong. (revised version)

Marsden, Peter V., 1990, “Network Diversity, Substructur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Contact.” In Craig Calhoun, Marshall W. Meyer and W. Richard Scott (eds.) *Structures of Power and Constraint: Papers in Honor of Peter Blau.* Pp.397-41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son, William M. and Stephen E. Fienberg, 1985, *Cohort Analysis in Social Research: Beyond the Identification Problem.* New York: Springer Verlag.

Mcpherson, J. Miller and Lynn Smith-Lovin, 1982, “Women and Weak Ties: Differences by Sex in the Size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 883-904.

McPherson, M., L. Smith-Lovin, James M. Cook, 2001, “Birds Of a Feather: Homophily in Social Network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7(1): 415.

Paxton, Pamela, 1999, “Is Social Capital Decli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 Multiple Indicator Assess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1): 88-127.

Popielarz, Pamela A. and J. Miller Mcpherson, 1995, “On the Edge or in Between: Niche Position, Niche Overlap, and the Duration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 Membership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698-720.

Putnam, Robert D., 1995,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65-78.

Putnam, R.,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Raudenbush, Stephen W. and Anthony S. Bryk, 2002,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Applications and Data Analysis Metho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Rotolo, T., 1999, “Trends in Voluntary Association Participation.”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No. 28: 199-212.

Ryder, Norman B., 1965, “The Cohort as a Concept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0: 843-61.

Simmel, Gerog, 1950,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Kurt H. Wolff* (ed.).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pp. 499-524.

Tocqueville, A. de.1961,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Knopf.

Yang, Yang and Kenneth C. Land, 2006, “A Mixed Models Approach to the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of Repeated Cross-Section Surveys, with an Application to Data on Trends in Verbal Test Scores.” *Sociological Methodology* 36: 75-97.

Yang, Yang and Kenneth C. Land, 2008,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of Repeated Cross-Section Surveys: Fixed or Random Effects.”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36(3): 297-326.

Yang, Yang, 2008, “Social Inequalities in Happ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2 to 2004: An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3 (April): 204-226.